

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讲 话

薛暮桥 等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F123.9/

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讲 话

薛 暮 桥 等 著

DI82/01

经济 管 理 出 版 社

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讲话

薛暮桥 等著

•

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总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13 310,000字

1984年11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0册

统一书号: 4361·12 定价: 1.90元

出版说明

为了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发展，今年上半年，国家体改委和中共中央党校联合举办了第一期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曾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和负责同志，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一系列专题报告。这些报告，比较系统地回顾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演变情况，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光辉历程，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景以及有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对上述报告材料选编加工前，又请报告人作了某些修改和补充。本书对于广大干部、经济工作者系统地了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有关理论知识很有帮助，也是各地培训经济干部，推动体制改革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	薛暮桥 (3)
关于经济体制的模式问题	刘国光 (13)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	林子力 (42)
计划经济与经济改革	廖季立 (60)
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廖季立 (69)
企业本位论	蒋一苇 (80)
经济民主论	蒋一苇 (105)
两级分配论	蒋一苇 (116)
经济中心论	蒋一苇 (122)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	周太和 (140)
关于计划体制改革问题	杨启先 (165)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发展	詹武 (182)
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加快城市改革的 步伐	宋一峰 (206)
我国建筑业的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	杨慎 (224)
关于商业体制改革问题	王桂五 (240)
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意见	陶力 (252)
我国物资流通体制的基本情况和改革设想	章慎义 (264)
关于银行的体制改革	赵海宽 (275)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的关系	高尚全 (286)
关于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情况	吴佩纶 (306)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问题	杨启先 (323)

运用经济杠杆的几个问题.....	詹 武 (342)
关于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	周新城 (361)
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几个问题.....	厉以宁 (385)

编者的话

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党校在今年上半年联合举办了第一期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集中培训了部分省市负责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干部。在此期间，研究班邀请有关同志作了专题报告，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介绍了国外经济体制的有关情况。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把这些报告材料汇编成册，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这对于加快城市改革的步伐，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与干部培训工作，将是一个促进。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揭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五年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开拓前进，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对于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深入搞好城乡各项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赵紫阳总理在全国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今后经济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件大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头绪纷繁，牵涉面广，需要大批干部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与组织协调工作。为了抓好体制改革这件大事，加快城市改革的步伐，有计划、有步骤地大量培训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干部，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近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空前活跃，本书所收集的报告材料反映了

其中的一部分研究成果。诚然，书中有些作者的观点还有不尽一致的地方，这在探索过程中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热忱欢迎大家继续进行理论联系实际探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在经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检验之后，必然会逐步统一起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必然会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得到完善。

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

薛暮桥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一点我们都是深信不疑的。但是，若干年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蒙上了一层阴影，失去了它应有的光辉。苏联在三十年代初期，当资本主义世界沉没在经济大危机中的时候，它象初升的太阳独自放出了万丈光芒，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当资本主义各国的科学技术迅速进步，人民生活随之有所改善的时候，苏联似乎渐渐减弱前进的动力。苏联的科学技术虽然也有进步，但革新迟缓，同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它的生产增长速度仍然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但消费品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供应丰富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世界上原来羡慕社会主义制度的进步人士，看了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情形，许多人发生了怀疑。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初生的社会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在竞争中战胜了资本主义经济，最后使资产阶级自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谁都不会怀疑的。但经过“三年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我们经济的车轮似乎出了故障，不像以前那样灵活转动了。这虽然主要由于政治原因，但经济活动的日益周转困难，

也是不容掩饰的事实。其它没有发生政治动乱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是缓慢的。这种现象究竟如何解释呢？

人们可以举出种种原因，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的经济工作往往违反了客观规律，以致于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以往历史上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都是受客观经济规律自发地支配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给人们自觉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认为人们在制订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时，可以不遵守客观经济规律，为所欲为，那就错了。其结果往往由于急于求成，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以致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不符合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管理制度，不是为生产发展服务，相反地为经济发展造成重重障碍。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虽然开始实行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但由于存在着大量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象汪洋大海的个体经济，所以我们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价格政策）还不能不较多地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对个体经济（主要是农民），我们主要利用价格政策（也就是价值规律）把他们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利用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来把他们的生产和流通纳入国家计划。加工订货和经销代销不但要执行正确的价格政策，而且要给工商业资本家以合理的利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善于利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小商品生产只受价值规律支配，资本主义工商业只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只有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才受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支配。事实不是如此，当时我们已经利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把它们都纳入国家计划，也就是说，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支配。当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在国民经济中占领导地位，我们的国家计划事实上已经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起支配作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同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律，但是我

们可以巧妙地利用这两种规律，在几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保证社会主义国家计划能在整个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这是当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够充分发挥的根本原因。

在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国家政策和国家计划似乎可以抛开客观经济规律为所欲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我们学习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是斯大林主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遵守客观经济规律，认识了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中仍有重要作用。但在“三年大跃进”时期，我们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把客观经济规律抛到九霄云外，结果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被迫下降，受到客观规律的严重惩罚。六十年代初期，经过五年调整，使国民经济逐渐回到正常的轨道。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根本否定了一切客观经济规律，把尊重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的主张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结果把整个经济秩序完全打乱了。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恢复了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的名誉。但是我们的价格体系和劳动工资制度已经弄得十分混乱，由此所造成的恶果在五年、十年中很难消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虽然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显然还没有根本解决。我们的经济关系已象一团乱麻，必须把它理出一个头绪出来，把各方面的关系“理顺”。所谓“理顺”，从根本上说，就是把它理到符合于客观经济规律。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以物价体系和劳动工资关系为例，现在还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而这些关系不理顺，整个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是很难彻底实现的。

社会主义国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常常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违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规律，生产关系的社

社会主义改造前进过快，超越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由于我国在解放前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还占优势，要跳过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成熟的社会主义，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二是违反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由于我们的经济比较落后，为着赶超资本主义，要求生产高速度发展，这就必须加速重工业建设，以满足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而使生产资料无法满足的需要。重工业发展过快，挤了农业和轻工业，使消费品的供应也日益紧张，人民生活不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得到应有的改善。三是不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还广泛地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实行计划管理时必须认真利用价值规律。多年来各种商品不但供应紧张，而且价格背离价值，助长了各种商品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四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重视按劳分配规律，提倡“大体平均，略有差别”。1957年起有二十年时间基本上没有增加和调整工资，使职工的劳动贡献与劳动报酬的距离愈来愈大，近几年作了几次调整，仍然难于解决。国家为着保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必须实行严格的计划生产和计划分配，其结果往往把经济管死。在发现这种缺点而放松计划管理的时候，又由于计划和价格背离客观规律，使经济生活陷入混乱状态，不得不又加强计划管理。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管理经常在管、死、放、乱中循环着。

为着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来调整国民经济，第一，必须放弃在生产关系方面盲目追求马克思所设想的典型的社会主义，也不能照抄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应当采取适合于我国具体情况的，适当分散和比较灵活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是必须坚持的。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必须有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并存，除了应当发展多种经营方式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外，还应适当发展个体经济，以及中外合资经营、外资独立经营企业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并把各种经济形式结

合起来，建成适合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经济。我国农业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退到在社队领导下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已经收到显著的效果。目前正在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产生不同于“三级所有”的各种专业化的经济联合体，形成符合于商品生产的新型的集体所有制，并与国营经济密切联合起来。我国国营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还在开始摸索阶段，由于“大锅饭、铁饭碗”以及其它外部条件的束缚，企业在劳动调配、物资供销等方面还没有必要的自主权，因此经济效益并没有象农业那样显著提高。在我国目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还不可能使社会主义以外的其它经济形式完全绝迹。私有制出现以来，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纯粹单一经济形式的社会。奴隶社会存在着大量的自由民，封建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小工商业者，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着大量的依附于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者（特别是家庭农场），社会主义经济也不能不是如此。

第二，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正确比例关系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不惜因此暂时放慢生产增长速度。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惊奇，说你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供不应求，只有增加投资，加快生产增长速度，才能使各类产品满足需要，为什么反而减少投资呢？他们不懂得，增加投资，会使生产资料的供应更加紧张，不能不加速发展重工业，挤农业和轻工业，使消费品的供应也更加紧张。只有减少投资，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才能缓和生产资料供应的紧张状况，并使国家有可能加速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使消费品的供应也缓和下来。“三年大跃进”时期，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紧张到使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都无法解决，生产被迫下降，人民生活陷入严重的困难。经过两年（1961、1962）调整，基建投资减少80%以上，重工业下降约60%，才使生产开始回升。到1965年，基本建设投资仍比1960年减少50%以上，重工业生产减少30%以上，轻工业生产则增加20%以上，生

产资料特别是消费品供应的紧张状况大大缓和了。从1978年到1983年的经验，再一次证明，只有把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到合理的规模，才能使各类产品的供需达到相对的平衡。

第三，必须善于利用价值规律以及其它经济杠杆，以引导各类产品的生产符合于国家计划和市场需要。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各类产品的供应绝大部分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小部分产品生产过剩，在仓库中长期积压。为保持物价的稳定，对供不应求的产品不敢涨价，出现亏损就由国家补贴；对积压产品，为怕减少虚假的财政收入，又不肯降价，至使价格背离价值的现象愈来愈严重。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不断调整价格，以保持各类产品供求的平衡。社会主义国家主要产品的价格，都由国家来规定，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已经受到严格的限制。正因为如此，国家就应当特别重视价值规律，在制订计划（特别是计划价格）时认真地寻找它，计算它，以此来制订和不断调整计划价格。由于社会产品有几十万种，有些产品（如纺织品和钢材）有上万种品种、规格、花色，完全由国家来订价是肯定做不到的。国家只能掌握几百、几千种主要产品，此外的小商品就应让价值规律去自发调节。由于各类产品成本和供求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国家连几百、几千种大商品的价格（加上品种、规格、花色就有几十万个价格）也是很难及时调整的。再加上怕影响人民生活或财政收入，往往知道需要调价而不敢调。这样价格背离价值的现象就无法避免，许多种产品（主要是成本难于下降的农产品、矿产品）价低利小甚至亏本，常常完不成国家的生产计划；而另一部分产品（主要是成本易于下降的加工工业品）则价高利大，常常超过生产计划，库存积压愈来愈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只好用计划来严格控制生产和供应数量。控制愈严，生产和市场需要的距离往往就愈大。如果放松计划管理而不调整价格，长线产品因为价高利大而积压更多，造成严重的浪费；短线产品则因价

低利小甚至亏本而减少生产，造成互相抢购，变相涨价，产生黑市，使国民经济陷入混乱状态，国家不得不又回到严格管理的老路上去。

由于以上两种情况不断发生，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受到许多人的怀疑，似乎反而不如受客观经济规律自发调节的资本主义。其实社会主义经济的缺陷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子比我们更不好过，它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大更多，而且二者的性质也根本不同。我们的问题常常是生产不足，它们是生产过剩。由于生产过剩，许多机器设备闲置，许多工人失业，资本家不敢投资。因此在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五十、六十年代，生产的平均年增长速度一般是3~4%，好的年份到5~6%。那时我国的平均年增长速度扣除“大跃进”后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两次下降，仍达8%以上（缺点是管理不善而经济效益下降）。从1974年起，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滞胀的困境，平均年生产增长率降到2~3%，有些年份生产下降。与此同时，物价上升，每年低的5~6%，高的达到10%以上。工人失业人数上升。资本主义国家的困难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因而是无法克服的；而我们的困难是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只要我们认真地进行调整和改革，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通过国家计划合理安排，排除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损失。我们废除了剥削制度，可以把资本家挥霍浪费的财富用于建设事业。由于我们具有这些优越性，我们生产的增长速度肯定可以显著地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如果我们滥用这些优越性，违反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结果就会欲速不达，比例失调，经济效益下降。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生产条件和人民生活都能够由国家来保证，如果大家都发挥主人翁的责任感，生产和生活就可以蒸蒸日上。与此相反，如果大家依赖国家，不动脑筋，

靠“大锅饭”、“铁饭碗”过日子,就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加上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由于计划不符合于市场需要,价格背离价值,劳动报酬不符合于按劳分配原则,我们的计划管理制度束缚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可能反而不如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我们认识了过去的失误,认真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肯定可以发挥出来的。困难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还没有一个完全成功的先例可供我们模仿。三十年来由于我们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不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而且各种经济关系(首先是价格和劳动工资)变成一团乱麻,互相牵制,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要使我们的经济生活恢复到符合于客观经济规律,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决不是像写一本教科书那样容易。人类研究自然界变化的客观规律已经有几千年历史,到十七世纪产业革命以后,才结出愈来愈多的科学技术的丰硕成果。但是人类对自然界变化的客观规律还远远没有完全认识,更不能自由掌握。如现在对寒暑旱涝等气候的变化仍然无能为力,许多地区生态平衡被破坏,造成环境污染,使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就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十七、十八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产生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古典经济学。他们认为,让商品经济不受干预,自由运转,就能永远保持平衡。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就指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死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证实了马克思的学说并使古典经济学因此破产。1934年美国罗斯福总统开始用国家干预来结束这一场大危机,接着就产生用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来防止危机的凯恩斯学说。凯恩斯主义无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经济危机的根源,经济危机变形出现:交替

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最后陷入“滞胀”的困难局面，凯恩斯学说也面临破产。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由于国民经济必须实行计划管理，认识和正确使用客观经济规律，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不易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课题。

1978年末的三中全会批判了过去的错误路线，提出一切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接着又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1979年，计划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省出钱来改善人民生活，同时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执行的结果，因基本建设项目早已上马，投资压不下来了。农产品提价和工资提级（加上奖金）又都突破原定计划，以致产生了170亿元空前高的财政赤字。1980年，计划内的投资压下来了。由于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实行“分灶吃饭”和利润留成，计划外的投资迅速扩大，总投资额仍然略高于1979年。加上农产品扩大了加价奖励和议购，职工的奖金发放失去控制，因此仍然出现120亿元财政赤字。1981年，狠压计划内和计划外的投资，对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进行了适当的控制，使财政收支达到基本平衡，扣除内债、外债收入仍有相当大的赤字。这一年农业生产增长5.7%，轻工业增长14.1%，重工业则下降4.7%（主要由于机械工业减产），在基建投资减少100多亿元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的供应反而比较缓和（机械产品供过于求），消费品的供应相当充裕，部分产品出现买方市场。调整工作开始产生明显的效果。

1982年继续执行原定方针，但计划外的投资又一次失去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又上升100多亿元，加上企业技术革新的投资，超过了1980年的最高水平。从这年下半年起，生产资料的供应又出现了紧张的局面。加上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又显著地超过轻工业，消费品的供应又趋向紧张。1983年我们又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狠压计划外的投资，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并继续保证轻工